

为往圣继绝学

——评王余光著《中国文献史》

易分田

西方人对甄选在人类历史上具有突出贡献的图书典籍发生着浓厚的兴趣,他们不厌其烦地评选出诸如“震撼世界的十本书”、“改变世界的十六本书”、“人类有史以来的二十本最佳书”等等,但是他们照例不去注意数千年漫漫历史长河中积累起来的数十万部中国古籍的汪洋大海。当然,在甄选数额比较宽裕的时候,也偶尔提及几册中国书,但这似乎仅仅表明他们并没有忘记遥远的地球东部还有这么一群黄皮肤黑头发黑眼睛的人以及他们的著作。由此,年富力强、精力充沛的武汉大学王余光教授叹息不已,“中国浩如烟海的文献典籍举世瞩目,但并不为举世所了解和熟悉。”(《中国文献史·序》)不仅如此,“即使是生活在中国的许多人”,“也同样缺少对中国书的了解”(同上)。尽管我们深知,人类历史的进程受着人类知识增长的强烈影响,而作为人类知识载体的文献典籍,它不仅记录着人类的过去,同时也影响着人类的未来。因此,学者们总力图从中推演历史的轨迹,并解释历史的成因,也希望从中探寻先民的古训和文化的传统,为新时代的价值观念确立基础。然而迄今为止,却没有一位中国学者对延续数千年、内容丰富、数量繁多的中国文献作过系统的总结和全面的揭示,对中国文献的整体历史也缺少完整的研究。出于职业的责任心,同时更因为中国文献那悠久而辉煌的过去,并不偏爱发誓的王余光在杀青他的力作《中国历史文献学》之后,遂立志撰写一部多卷本《中国文献史》。当然,我们现在有幸看到的只是全部五卷本《中国文献史》中的第一卷,但从作者的规划中,我们不难体会到它的宏伟和庞大:“这部文献史分为十编,即第一编:绪论;第二编:先秦文献;第三编:秦汉文献;第四编:魏晋南北朝文献;第五编:隋唐五代文献;第六编:宋代文献;第七编:西夏辽金元文献;第八编:明代文献;第九编:清代文献;第十编:民国文献。”如此看来,这项开创性的巨大工程可以用这么一句充满溢美色彩但并不显得阿谀和过分的古语来形容:为往圣继绝学!

1937年以前,有学者统计,我国历代出版的图书达25万余部,而这仅仅是图书的数量,尚不是全部的文献——我国国家标准《文献著录总则》规定:文献是“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图书以外,我国还有大批的甲骨文献、铭文资料、石刻资料、简牍、敦煌遗书、吐鲁番文书、历史档案等等。此外,近代以来,我国还出版印刷了大量报刊文献和内部资料。除了数量浩繁的卓然景观以外,这些文献的内容更是包罗万象,不一而足。它们是先民们凭藉理性与智慧的烛光,在漫漫长夜中堆叠起的一座高高的文化之山。面对这么一座令人惊讶的蕴藏着无尽宝藏的文化之山,从整体上把握而不是从某一方面去掘宝,这对任何一位即使是经验丰富的研究者来说,都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它需要研究者具有全方位判断问题和细致入微的分析问题的能力,其中尤为关键的在于,从方法论上寻求入山的门径和确立一个能够纵观全局的基本点。“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惟其如此,人们才能够通过研究者的成果对这座高高的文化之山发生由衷的兴趣和难以忘怀的印象。尽管这种要求显得太过严格甚至苛刻,但《中国文献史》的作者却并没有因此而气馁与懈怠,他在洋洋12万言的《绪论》中所显示出的筚路蓝缕之功和雍容大雅的学者风度令人钦佩。

研究中国文献史,作者指出,应该从这些角度入手:第一,界定文献史的分期;第二,廓清文献史的内容;第三,总结历史上文献史研究的成果。诚然,从这几个问题的提出来看,作者并没有刻意标新立异而一己取宠,便不难发现这篇洋溢作者史学才华的《绪论》的确具有令人耳目一新的显著特色。

对于任何一个历史研究者来说,历史的分期问题无疑是他所面临的首当其冲的问题,中国文献史研究自

不例外。在王余光以前,学者们对中国文献的主体部分——图书发展的历史进行过不少的描述并找到了书史分期的划分依据,而这些依据尽管各家自有说道,但基本上是以图书的物质形态作为主要标志的。对此,《中国文献史》的作者断然表示,图书物质形态的变化不可以从实质上表明图书的发展。他在罗列大量实据以后,十分有信心地说:“文献著作量的变化是文献发展阶段性划分的主要依据,某一时期的文献著作量的增损则是这一时期文献是否发展的主要标志。文献物质形式的变化不能从实质上表明文献是发展了,而新文献的增长则正从实质上表明了文献的发展,新文献的增长速度标志着文献发展的进度。”(第79页)这样,依据中国历代文献著作量的情况,作者将中国文献自远古至1949年的发展过程分为这么几个阶段:(1)中国文献形成时期,公元前2世纪以前;(2)中国文献成长时期,公元前2世纪至2世纪末;(3)中国文献发展时期,3世纪初至13世纪中;(4)中国文献中衰时期,13世纪中至14世纪中;(5)中国文献再发展时期,14世纪中至19世纪末;(6)中国文献昌盛的开端,20世纪初至20世纪中。对上述第六阶段,作者补充说道:“这一阶段时间较短,把它称为一个时期不太合适,故以‘开端’名之。”(第80页)

为了更充分更令人信服地阐述这一新颖独到的分期观点,作者又不惜精力和笔墨,专列一节“影响中国文献发展的各种因素”(第80页),从政治的、学术的、宗教的、科技的、经济的因素等方面讨论了中国文献发展的阶段性和各个阶段发展的不平衡性,其中不乏作者认真思索后的精辟结论。很显然,这些论述绝不能被看作是作者“为赋新诗强说愁”的喋喋不休的文字游戏,尽管其观点绝非唯一正确并且也绝不可能为所有的学者所接受,但它无可争议地作为中国文献史研究中一个可喜的新视角而显示其应有的价值。

中国文献史的研究内容,作者认为由下述四方面组成:(1)文献的发展过程,内容包括文献物质形态的发展过程,文献编作、流传、收藏方式的发展过程及文献类别与内容的演变;(2)影响文献发展的各种因素;(3)文献发展过程中的文献整理与揭示,文献整理与揭示的发展过程,就是文献在发展中不断完善和不断被利用的过程;(4)文献发展的阶段性与规律性(第76页)。作者同时强调,研究中国文献史,应注重中国文献中各种民族文献的构成。对于民族文献,作者尤为敏锐和动情地说:“中国历史悠久,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汉民族和一些少数民族都逐步发明了本民族文字,形成了为数众多的本民族文献,这些文献共同构成了中国文献的整体,成为中国文献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第38页)。尽管汉文文献是中国文献中历史最久、数量最多、使用面最广的一种,并在中国历史以至世界历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但它不代表全部的中国文献。作者的多卷本《中国文献史》将是一部能够体现中华民族文献发展历史的宏篇巨制。

作为一部完整的全面的文献发展史,不应该仅仅是文献流传过程的单调勾画,同时还应该是文献不断被整理和揭示利用这一过程的绘声绘色的描述。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必为作者所表达的文献史研究内容是否完备和充分而感到忧虑。作者以文献发展过程中的文献整理和揭示利用作为文献发展史的一个重要内容,这种做法无疑是周到和明智的。因为文献所产生的社会意义和价值是以文献整理和揭示利用为前提的,也就是说,只有不断地被整理和揭示利用,文献才能不朽。

如果一味地褒扬作者的开创之功而忽略前人的智慧,那么作为评论家,我们的工作是不称职的;同时,如果作者不去理会前人的智慧和成果而数祖忘典自以为是,那么作为历史学家,他的工作也将是黯然失色的。虽然迄今为止,在中国文献史研究领域中,还没有一部系统的、总结性的作品问世,但“大约在战国时期,人们对中国文献的起源和发展就有所认识”了(第128页)。在此后的漫长岁月中,不少学者甘守淡泊,兢兢业业地从事于文献整理与文献研究的寂寞而枯燥的工作,积累了许多颇可推许的成果,这些成果都毫无例外地成为后来研究者的必然起点和基础。因此,《中国文献史》的作者在其《绪论》最后,花了整整两章的篇幅——“中国文献发展过程中的文献整理”(第89页)、“古今学者论中国文献”(第128页)——充分展现了历代学者在文献和文献发展方面的研究面貌,从而也使我们一睹中国文献史这门年轻而古老的学科的丰姿神韵。

然而不无遗憾的是,作者在向我们展示这一丰姿神韵的时候,偶尔也流露出作为学问家所不应有的毛毛脚甚至漫不经心,比如他说:“清末以来,我国文献史上有几次重大发现,这就是殷墟甲骨文文献、汉晋简牍、敦煌遗书和明清档案的面世。许多学者专门从事这些新文献的研究,并形成了一些专门学科,如‘甲骨学’、‘敦煌学’等,丰富了中国文献学的内容,而这些新文献的发现,也为中国文献史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材料。”(第146页)如此丰满充实的历史现象竟让作者一笔带过,这种大写意手法的运用,在这里显然是不恰当的,也是读者所不愿接受的。与此同时,我们有责任指出,读完这篇洋洋洒洒长达十数万字的《绪论》,我们还没有得到一个

关于中国文献发展史的整体印象,也就是说,假如作者能再涂重彩,妙笔生花,对中国文献发展史的概况作一综合叙说,那么读者将会更深切地体会到中国文献的灿烂辉煌。当然,这个要求确实有些挑剔,因为全部多卷本《中国文献史》本身就是一部综合叙说中国文献发展史的著作。但是,我们体察民情的作家们应该有所警觉,增幅无多,而读者幸甚,两全其美,何乐不为!可是现在,我们只有耐心等待着这部卷帙不知凡几的《中国文献史》的全面面世了——但愿这企盼不至于遥遥无期。

《中国文献史》第一卷内容包括两部分,即上述第一编《绪论》和我们即将开卷的第二编《先秦文献》。在第二编中,作者从中国文献发展的源头开始娓娓叙说,从而正式揭开了中国文献史的第一页。同时,作者也向我们展示了中国文献史研究的一个绝好实证,对促进这门学科日臻完善当具推波助澜之功。

中国最古老的文献无疑是汉文献,而“文字是构成文献的必要条件,有了文字,才有文字记载,也才有文献的形成。……在中国文字中,要算汉字的历史最为久远。”(第155页)因此,与所有通史研究者追本溯源的例行风尚一样,作者的视野首先投向了这里:汉字的发明与汉文献的起源。在充分利用最新研究成果和最新考古材料以后,作者指出:“在现在看来,汉字产生于龙山文化晚期,即传说的黄帝时代,距今约4000余年,应是可信的。传说黄帝之史仓颉造字,应理解为仓颉对原有的各种记事符号进行整理、加工、修正、创制和推广,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可信的。西安西郊花园村出土的甲骨文文献可以看作是我国汉文文献的起源,从这时推算,它至少已有4000余年的历史了。正是在这4000余年内,汉文献逐步走上了从发展到繁富的道路。”(第167页)当作者进一步依据丰富的考古材料对商代文献面貌进行揭示的时候,我们发现,并非甲骨文学家和古文字学家的作者竟能对甲骨文献的形制作出超出前人的较为完善的总结(参见第179—183页),实在难能可贵。这一点,不能不归功于作者广博的学识和精湛的综合能力,同时,也使我们对本书的质量更加抱以信心。

应该说,周代文献才是全部先秦文献的重镇。很显然,作者比我们更早地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他断然用了三章——也就是本编一半的篇幅,全面展示出一这时期各类文献的风骨风貌,如甲骨文文献、铭文材料、盟书、简牍、帛书以及流传下来的典籍等等。事实上,在这些方面,前人的研究成果早已蔚为大观并几乎曲尽其妙,因此,对史实以及前人研究成果的罗列和铺陈就似乎成为后学难以避免的苦役了。尽管如此,作者仍然不失时机地抒发着自己独到的见解。比如简策的形制问题,前代权威学者多将其描绘得有如后世纸张图书一般秩序井然、规律毕现。其实,作者说,这些论者“大概都未亲见先秦简策,所论未必确切。”“我们对先秦简策实物的观察,很难看出其长、宽、厚三者的长度有什么规律,其长度与古文书记载也不相符。”(第217页)继而作者又表列长沙五里牌、江陵望山、随县擂鼓墩等八组先秦简策长、宽、厚等形制,进一步得出结论:“先秦简策书籍的形制情况如何,我们还缺少必要的实物材料来加以说明”(第217—218页)。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是一个务实的结论,它表明了作者令人赞叹的治学态度。

在展示夏、商、周三代文献之盛的基础上,作者又讨论了这一时期文献的编纂、整理、收藏与禁毁等问题,全面系统而又鞭辟入里。其中尤为具有启迪意义的是作者关于文献禁毁问题的论述,这些论述使《中国文献史》第一卷避免了许多作品所易犯的头重脚轻的毛病而显得善始善终。

还是在公元前500多年以前,中国人便已确立了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观点,以其作为人生观的主要内容和一种独特的道德精神体系。而对于那些不谙韬略又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学士来说,“立言”——著书立说便成为他们人生的最高追求。他们为此耗费了毕生精力和心血,并祈祷上苍佑护,使其著作能够藏之名山、传之万世。但正如作者所说:“文献本身不仅仅具有一种文化和学术上的意义,它既可作为某种政治的宣传工具或被某种政治所利用,亦可能与某种政治相违迁。这样,某种文献与一时政治相违迁,就可能遭到禁毁”(第266页)。中国历代专制统治者可以随时以自己的政治目的和手段对不利于其统治的图书文献进行禁毁,这种惨痛的文献之厄从先秦开始便不绝于史。然而,这令人生畏的刀光剑影并没有吓退那些顽强而虔诚的知识分子,为实现其“立言”理想,他们永远在这黑白之间诉说着自己忧国忧民、扶弱抗暴的款款心曲,并构筑起中国文化实体与精神的大厦。惟其如此,中国文献才能够象长江黄河那样奔腾不息,沿沿相因,代代相传。——也许,这就是我们今天需要一部宏贍而真实的《中国文献史》的最深刻的原因。